

# 論韓少功近十年的歷史反思與 感性特質—— 以《日夜書》、《革命後記》與 《山南水北》為核心

黃文倩

淡江大學中國文學學系助理教授

## 提 要

本文以韓少功近十年的三部代表作：《山南水北》（2006年）、《日夜書》（2013年）及《革命後記》（2014年底）為核心，分析與評述他對新中國建國文革以降的歷史反思及感性特質。包括對中國農村生活與勞動實踐、知青與後知青史，以及大陸文革歷史的辯證認識等。本文認為，這三部作品，雖然有出版時間先後及題材側重的差別，但就整體上來說，仍應該視為韓少功同個階段有機的思想環節，是他分別從不同的角度，反省中國的本土與現代性轉型的重要組成部分。如果說《山南水北》是他活在當下的新實驗（仍持續進行），《日夜書》和《革命後記》就是他清理及回應過去的努力，只有整合起來，才能理解韓少功嘗試走向的未來——透過對有勞動、革命與公共實踐等思想資源的新中國歷史的再發現與檢討，才能續續徵用它們作為前進的方法與力量。在這個意義上，《山南水北》

的成書年份雖然早於《日夜書》與《革命後記》，但它仍再實踐與推進的正是中國未來的本土現代性。

**關鍵詞：**知青 文化大革命 本土現代性 勞動 感性

# 論韓少功近十年的歷史反思與 感性特質—— 以《日夜書》、《革命後記》與 《山南水北》為核心

黃文倩

淡江大學中國文學學系助理教授

……真正的學習和追趕應該是創造，不是「尾隨」。……我們確實需要一個開始。這個開始是恢復創造力，投入思想和制度的創新……。實現各種不偉大的人生中一種不那麼壞的人生……。——芳菲、韓少功〈理想的、或非理想的生活——對話韓少功〉<sup>❶</sup>

## 前言

韓少功（1953-）是大陸知名的「知青」世代作家與知識分子，著作等身，重要及代表性在兩岸已成定論。21世紀起，韓少功無論就思想與創作量，也一直維持相當的豐富性與一定高的水平，若與許多同時代的大陸知識分子相比，更能看

---

❶ 芳菲、韓少功：〈理想的、或非理想的生活——對話韓少功〉，原載於2007年《南方週末》，後收入韓少功《山南水北·附錄》（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8年5月），頁297。

出他非世俗與非主流的思考實踐與獨立品格。近十年，他出版了三部主要代表作：《山南水北》（2006年）、《日夜書》（2013年）及《革命後記》（2014年），從題材到思想視野，分別涉及了中國農村生活與勞動實踐、知青與後知青史，以及大陸文革歷史的辯證認識與反思等。同時，這三部作品，雖然有出版時間先後及內容側重的差別，但就整體上來說，仍應該視為韓少功同個階段的思想的有機環節。我甚至認為，這三部著作，可以看作韓少功近十年反省——二十世紀中國文化大革命乃至改革開放以降的歷史的方式。有鑑於《革命後記》在大陸有一定的敏感性，僅曾選刊於大陸的《鍾山》雜誌2014年第2期，完整專書則由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2014年），兩岸討論韓少功近十年的歷史、思想者較有限<sup>②</sup>，所以本文想嘗試以一種融合及參照台灣的鄉土與現代性的感覺和視野，作為再次閱讀與理解韓少功的進路與方法，先從《日夜書》及《革命後記》開始個論，最後再綜合評述《山南水北》，一方面說明我目前理解的韓少功思考的多元有機面向，二方面定位《山南水北》仍「在路上」的特殊性與意義。

## 一、《日夜書》：「人民」的「後知青」視野

《日夜書》基本上是一部「後知青史」<sup>③</sup>。與大陸早年的知青書寫，如阿城《棋王、樹王、孩子王》、史鐵生《我遙遠的清平灣》及韓少功早期《爸爸》等作相參照，小說背景的尋根及懷舊的時代已正式成為過去，主要的時序來到改革開放後的N年，資本主義和連帶的新型的非社會主義的價值體系大舉進入中國，

---

<sup>②</sup> 在台灣，雖然有包括唐翼明、宋如珊、彭明偉等先生研究過韓少功，但截止本文以前，多集中在他早期與中期的代表作，從時間上來說，基本上亦主要以新世紀（21世紀）前的作品為研究對象，對晚近韓少功作品的討論明顯不足。而在中國大陸，由於《革命後記》有一定的敏感度，亦較少列為研究主體，然而，如果要理解韓少功進入成熟階段的思想與作品，也不能迴避此書，同時，目前大陸學界與評論圈，多將這幾部作品單獨散論，以參照並綜論其晚近的歷史反思與感覺結構的視野仍較欠缺，故本文可能有一定的補充空間。

<sup>③</sup> 「後知青史」在本文的涵義，指的是中國大陸的知識青年們，在政治所運作的「上山下鄉」運動正式結束後，再到回到既定的社會、生活與生命軌道，及當中所發生的新的歷史經驗。

當年熱烈擁抱紅色革命與理想主義的知青們（和他們的後代），也走向各式各樣不同的命運。

從小說的結構來說，韓少功維持了他長期的寫作方式——他不是以傳統現實主義的某個人物命運為中心，線性地展現主人公的變化和社會變遷——或許由於那種「古典」的時代已經一去不返，也或許僅僅只是基於創作者難以掌控「後知青」全貌的謙虛與謹慎，韓少功在《日夜書》中，主要採取「碎片」，或者說放射狀的零散結構，來表現他筆下的各式知青朋友們的後續命運，這一點跟他在《馬橋詞典》、《暗示》的寫法，形式上並無太大的差異，也因此，儘管「我」曾是知青歷史中的一份子，但這本書的敘事眼光、立場仍多為旁觀，甚至刻意保持距離與流動，整體的姿態——故事是聽來的故事，見證也只能見證一部分，記憶的選擇性、想像、虛構無處不在，作者與敘事者對此充份自覺。

無論是大陸版（2013年3月上海文藝出版社）或台版（2013年11月台北聯經出版）的《日夜書》，它們的折頁／書背文宣，均強調此書的「後知青」的「身份」特色，暗示著它是一部書寫「後知青」日後成為官員、工人、民營企業家、藝術家、流亡者的「身份」之書<sup>④</sup>，但若仔細閱讀，會發現韓少功所要反映或表現的重點，其實並非是這些知青日後的「身份」意義。事實上，《日夜書》表現的人物極多，遠遠超過兩岸出版商所強調的這些人物類型和身份概括。二來，就實際寫的比較深刻且有特色的篇章來看，很多更是一些沒有什麼「身份」的配角和狀態——在那些人物與細節裡，往往更能看出韓少功對歷史中具體的人的關懷，以及他綜合的臧否和思想傾向——歷史並非全由日後有「身份」的人所構成與決斷，歷史仍是「人民」群眾的歷史。以下舉幾一些比較重要的例子與問題意識來說明。

「馬濤」是敘事者特別有敬意與感慨的一個角色，在《日夜書》中占有不少篇幅。他政治自覺強烈，能言善辯，長於打派仗，日後甚至曾被密告入獄，是具有頗強的激進與傳奇色彩的紅衛兵。敘事者從他身上，深深地理解了生命中豪情

---

<sup>④</sup> 參見大陸版韓少功《日夜書》（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13年3月），封底折頁文案，及台灣版韓少功《日夜書》（台北：聯經出版公司，2013年11月），封底文案。

壯志的偶然性起源，但也反思出知青時代和「革命」，對一種「暫時的鄉下人」（知識分子下鄉）的知性與感性間的關係——恰恰是有了革命、大敘事，才使得世俗與日常中的個人化問題、消費文化暫時不能產生作用，甚至將自己的角色神聖化：

一個鄉下人，心裡裝著馬克思和巴黎公社，裝著「重上井崗山」那種坊間流傳的密旨聖意，哪還有工夫嫉妒？哪還有工夫自卑？哪有工夫婆婆媽媽地上街淘貨？……反動派肯定不會自動垮台，街壘戰鬥太有可能在這一城區打響。……起義者該在何處阻擊，從何處增援，去那裡割斷電話線，在什麼地方建立指揮所，加強政治攻聲的高音喇叭該如何架設……豈能不預先有所規劃？<sup>⑤</sup>

這段話說的有點匠氣與刻意，但敘事者想再現的應是當時青春的本質。畢竟，對於「知青」來說，無論他們當年是自願或勉強下鄉，農村之於他們，大多數仍是一種過渡的歷史與政治空間，也因此，他們是一種「暫時的鄉下人」，對革命的英雄主義與浪漫主義的想像和實踐，與其說是來自於主體的意志與存在的選擇，不如說是來自於歷史的生產。所以，一旦歷史條件過去，敘事者連帶見證「後知青」時代的馬濤的命運時，就多少對他有點諷刺——韓少功以馬濤的第二任妻子肖婷來襯托他的命運——肖婷因為崇拜曾政治受難的馬濤而嫁給她，但婚後日子其實過的並不好，她又比陳映真筆下的唐倩更務實與自覺，婚後很快就發現丈夫雖然有很強的政治理想與權利慾，但視野、見解和人格胸懷，卻並沒有隨著歲月與時俱進，對世俗生活也很計較，他們日後「流亡」到國外，馬濤由於面子和語言能力有限，日常生活亦只能多由肖婷承擔。敘事者「我」，雖然看出肖婷也有相當膚淺的許多面向，但落實到過日子，她的為人處事又遠比昔日的政治受難的知青更為客觀——她不但能忍受愈顯平庸的丈夫，理解他在國外不受重視下的脾氣，還得低調中性地修正他的誇大和偏激，協助他在一個資本主義的社會與空間

---

⑤ 韓少功：《日夜書》（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13年3月），頁90。

裡，為昔日的理想找出路與安頓。換句話說，敘事者在一種今昔對比的架構下，描繪出昔日英雄主義的男知青，在後革命時代的難以為繼，間接突顯世俗的肖婷的主體互補並非全無價值。

「大甲」則是作者反省「藝術」與現實關係的重要個案。薛毅曾在跟吳曉東的對話錄中說：「在中國現代文化的架構裡，審美被當成是『人的解放』的一大重要領地。它是人們的價值信仰相關的，是可以用來取代宗教的這樣一個位置。」<sup>⑥</sup>《日夜書》的「大甲」，就是這樣一個執著於審美追求的人物。韓少功細數他在改革開放回到城市後的生存狀態：「進過劇團，辦過畫展，打過群架，開過小工廠，差一點投資煤礦，又移居國外多年……但到底幹了些什麼，不是特別清楚。憑一些道聽途說，我知道他最終還是在藝術圈出沒……。」<sup>⑦</sup>換句話說，「大甲」最終成了所謂的「藝術家」——後來還曾以一種最狗血的藝術靈感莫名奇妙賺了大錢，他的藝術觀充滿虛無和百無聊賴，自己都覺得荒謬，敘事者很清醒地看出這一點，對此不無諷刺，因為在敘事者「我」的記憶裡，「大甲」在知青時代雖然傳奇——通曉許多才藝，但終究是一個不願意長大社會化和承擔的偽成年人，高度實用主義傾向的農民們，也不見得認同這種天才。然而，作為同屬八〇年代深受自由解放意識影響的創作者，作者仍願意給這樣的人物，保有一些非實用意義的空間和價值，所以敘事者這樣寫到：「在將來的某一天，他可能勛業輝煌名震全球，像他自己吹噓的那樣；也可能一貧如洗流落街頭，像他前妻和兒子說的那樣。但不管落入哪種境地，他都可能掛一支破吉他，到處彈奏自己的偉大理想。」<sup>⑧</sup>在這裡，可以感受到敘事者對藝術、審美追求和現實人生互涉的尊重與警惕，或者更精確地說，是對於某種革命中不斷追求的精神境界與日常世俗平衡的警惕。類似的人物還有「小安子」，在「知青」時代，她就精力充沛，永不疲倦，即使在夜裡，也可以去教別人游泳、拉琴，甚至還敢找敘事者「我」一起去抹屍，

<sup>⑥</sup> 薛毅、吳曉東：〈文學性的命運——與薛毅對話〉，收入吳曉東《文學性的命運》（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4年4月），頁21。

<sup>⑦</sup> 韓少功：《日夜書》（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13年3月），頁17-18。

<sup>⑧</sup> 同上註，頁20。

以求吃一頓喪家招待的肉，青春、活力和勇氣兼備，但是她的「審美」的性格與水平，在「後知青」時代，就不一定有擴充、成長與轉化的條件，在革命文化的影響下，「小安子」不但日後有了性怪癖，還有受虐傾向，似乎只有在強制和迫害的感覺下，才能自我放鬆。韓少功或許沒有要特別思考革命女性、或說女性在革命形勢下的審美和生命發展的關係，但他可能偶然地靠近了「小安子」不同於男性的機會與命運悲劇。

知青閻小梅的命運，僅占此書很短的篇幅，但她也是一種大歷史下的「人民」的一種類型。小梅在一場大暴雨中，因為不理解大自然動物們的警告，跟其它幾位女知青，一起被洪流沖走死去。她曾是一個才女，對農村失學的孩子也特別關心，算得上是個好人，但閻小梅也似乎涉及了當年馬濤被密報的事件，性格並非完全沒有陰影。這是歷史中的小人物，巨流河中的清描淡寫，而人死了，許多事情與真實也就更無從釐清。敘事者感慨地表示：「人們肯定都希望往事乾淨一些，溫暖一些，明亮一些。」<sup>9</sup>暗示事實恐怕遠非如此，然而，很多歷史的是非似乎只能這樣到此為止，韓少功刻意留下閻小梅這樣的個案，意義或許是一種如細針般的存在，以一種會令人刺痛及不安的記憶和感性，完整知青史與後知青史。

此外，儘管韓少功長期以知性與思考型寫作知名，但我仍然發現，《日夜書》還是有一些獨特的神秘與感性，以及幻覺書寫，能夠展現韓少功在理性之外，難以被概括的、流動的精神世界。例如，在神聖的革命青春的農村時代，「我」和曾喜歡過的女孩馬楠共渡「初夜」，兩人嚴肅地談情說愛，有著專屬於中國革命時代，才有可能出現的「戀人絮語」。例如，「我」曾這樣對馬楠說：「有人欺騙我們，我們不欺騙。有人侮辱我們，我們不侮辱。有人傷害我們，我們不傷害。……問題是，太難了。……戰勝一個人很難，但最大的戰勝是不像對方，與對方不一樣。這就更難。」<sup>10</sup>在這裡，革命和戀愛同構，同時聯繫上一種普世性的人道倫理的哲理與價值，但正當讀者可能準備溫情主義地接受這樣的「話語」與信念時，多年以後的敘事者「我」，卻告訴我們：「我其實並不能確定我與她有過這

---

<sup>9</sup> 同上註，頁 115。

<sup>10</sup> 同上註，頁 137。

樣的對話，不能確定有過這樣一個山谷裡的初夜。」<sup>11</sup>似乎又把可能的一段美好的回憶、確定的「普世」價值和信念也解消了，呈現出主體的擺盪與感覺焦慮。

《日夜書》寫被迫害妄想症，寫妄想的幻覺和孤獨感的細節亦好，語言質感近似魯迅的〈狂人日記〉，例如像這樣：

我出現了幻覺，一眼識破了他們的狼子野心。他們當然是串通了要算計我。……我的臉盆不見了，似乎與屋檐下的兩只麻袋有關係，麻袋準備用來裝什麼？裝了以後是否要往河裡扔？第二天，我發現屋檐下麻袋不見了，但多了一些草繩，那麼情況當然更為可疑。草繩準備用來捆什麼？什麼東西才需要捆綁或者緊勒？<sup>12</sup>

同時，這種覺得自己快發瘋的幻覺與孤獨，卻也讓「我」能釋放一些極少有的詩意、溫柔和靈性——能夠作夢。在夢裡，「我」喃喃自語，召喚昔日的情人馬楠，在安全的絕望感中，「我」恢復並釋放了敏感的移情能力——那是長年的革命與理智規訓中少有的品質：

我的心在發緊。馬楠，馬楠，你怎麼在這裡？你為何成了一只松鼠，有了滿臉和滿身的須毛？怎麼裝入一只帆布袋任人擺佈？……我們之間橫隔了幾十年，幾百年，幾千年，幾萬年，早已遙不可及。那麼在擦身而過之際，在無望再會之時，在人頭攢動車水馬龍繁花似錦的這個街面，你實在忍不住了，只能以一個幾無形跡的問好，暴露你曾經為人，曾經有愛，曾經有委屈，黑幽幽的眸子裡也隱藏了一份往世前生。……我醒過來了，發現自己淚流滿面。<sup>13</sup>

---

<sup>11</sup> 同上註，頁 138。

<sup>12</sup> 同上註，頁 123。

<sup>13</sup> 同上註，頁 128。

這是一段非常奇特的「務虛」敘述——疼惜對方竟然變成了松鼠，想像對方在某種非現實的偶然中，幾乎形跡地向「我」問好，充滿著對彼此關係無望的孤絕與深情，或許這也可以看作一種：為知青及後知青史，保留生命中些微偶然、隱密、美好的靈性世界的渴望與尊重。

## 二、《革命後記》：理性自覺的個人化補充

《革命後記》2014年出版於香港，是韓少功嘗試對文化大革命歷史化和具體化補充的一種書寫。儘管海內外無論左翼右翼的學者、知識分子，對中國大陸的社會主義革命與文革的研究及敘說並不少<sup>14</sup>，也有許多個人感性的經驗敘述<sup>15</sup>，但是，文革仍是目前大陸較具有爭議性及敏感的命題，難以複雜化且公開地辯證討論，影響所及，造就了民間一些高度簡化文革事實的通俗論述。韓少功並非是社會學家、歷史學者，作為一個文革時期的激進青年，父親在文革時自殺，他對社會主義的理想投入，以及至親投入社會主義理想所付出的生命代價，這種雙重的體驗，都讓韓少功對這段歷史有特殊的執著。

整體上來說，《革命後記》是一種帶有個人化的敘事、補充的後記，主觀性必然存在，它的寫法建立在預設了某些需要再被辯證的論述與對象——通常是目前世俗對文革理解過於簡化、常識化及弱智化的意見。但是，我們卻不能簡單地批評——韓少功完全是以一種個人經驗來回應歷史，事實上，作者在個人經驗與主觀見解之間，援引了許多思想家、學者們對革命、烏托邦、民主、自由、中國

---

<sup>14</sup> 如費正清《偉大的中國革命》（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9年9月）；陳永發《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台北：聯經出版公司，1998年12月）；麥克法夸爾、費正清編《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中國革命內部的革命：1966-1982》（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7月）；高泉《後文革：中國自由化潮流》（台北：聯出版事業公司，1999年1月）等書。

<sup>15</sup> 如定宜庄《中國知青史：初瀾》（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1月）；鄧賢《中國知青夢》（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6月）；王力堅《天地間的影子：記憶與省思》（台北：華藝數位出版，2008年12月）；王增如、李向東《上山下鄉》（台北：人間出版社，2013年8月）等等。

鄉土等等問題的各式論述與想像，並以一種相當清楚、簡明、流暢的白話文表達出來，相當具有擴充及普及讀者的自覺。這就使得韓少功這種對革命的反思，並沒有停留在個人化的自我救贖意義上——韓少功似乎想要引導更多的「人民」群眾，在中國曾實踐的社會主義的基礎之上，再度反省：「中國往何處去」的現代共同體命題。

首先，韓少功將對文革的反省，概括在「宮廷化」、「道德化」和「訴苦化」的傾向性上。在「宮廷化」上，他意指許多人往往將中國大陸的政治和社會問題，坐實在一些中共高層領導人和他們的鬥爭，而忽略了極左並非中國社會主義實踐的特產。韓少功似乎希望暗示讀者，能多聯繫上其它的面向，例如個人崇拜、高度集權、長官經濟、政治高壓、文化禁錮、人權災難等等問題也需要關注，然而，如何聯繫，如何展開解釋，《革命後記》在這部分，沒有更具體地再細節化，恐怕仍是有一定政治上的敏感度。在「道德化」這一小節中，韓少功認為讀者有必要再自覺：政治人物並非聖人，他們：「因利益、面子、意氣、人脈關係等發生互相磨擦，繼而發生擠壓或對撞，都實為尋常，與市井糾紛和家長里短沒有太大不同」<sup>16</sup>——後者的判斷可能聯繫太快——市井、家常問題跟政治問題，還是應該區別對待，但韓少功希望讀者不要將複雜龐大的中國現當代史，僅僅理解為上層人物的權利鬥爭，或某些個人的道德作風，換句話說，應該跳脫常識與世俗中的個人關係，展開政治、文革與公共視野的理解，是更切合實際與廣義的現實的思維方法。進一步，在「訴苦化」一小節中，韓少功企圖從更大的視野來重新理解「訴苦」——他聯繫上中國「文革」時間相近的其它世界，認為那時也有很多人民受到政治上的傷害，但是他們並沒有機會訴苦與得到關注，韓少功舉例說到1965年印尼右派軍人發動的政治暴力——在1966年已導致超過100萬的左翼人士和穆斯林的死亡，這則延伸的意義可以是：知識分子的「訴苦」，作為改革開放後的一種現象，究竟跟當時世界中的其它苦難，或當時社會中的其它階層有什麼關係？或遮蔽了什麼視野？「訴苦」如何從個人（知識份子）的傷痕，走向更多數人的

<sup>16</sup> 韓少功：《革命後記》（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4年），頁19。

公共正義，是韓少功提示給知識分子型的讀者的思考與倫理責任。

同時，如果說某種程度上，文革給了大陸「知青」一代人，有種「以天下興亡爲己任」的胸懷，落實在現階段的國家問題，是中國應如何形塑具有本土特色的現代民族國家之路，這當中必然也涉及到對毛澤東在艱困的內憂外患時代的一些政治權衡，需要實事求是的評價。韓少功認爲，中國自鴉片戰爭以來，各方面的條件不足，例如要向西方列強支付戰爭賠款十數億兩白銀，1950年代初，曾有45個國家聯手對華禁運1700多種物品等，再加上氣候和農耕土地的條件，不若某些西方列強，在在都讓中國的現代化轉型之型特別困難，是以，在早年的社會主義實踐裡，對中國農村的的地主的階級劃分，自然也是處理與回應當時歷史與經濟調控的一種策略，儘管並非完全沒有錯誤。然而，韓少功也引用了包括費孝通、楊奎松甚至孫中山的話，企圖說明中國自古以來，並無太嚴重的地主階級剝削，小地主也並非是那麼「養尊處優」，這樣的表述自然是對於過去中共極左地處理地主和佃農問題的一種補充，不可完全泛普遍化地看待。

進一步，韓少功也企圖回應目前對中國「民主」、平等問題的想像與關注。有鑑於自上個世紀八〇年代以降，西方自由主義邏輯成爲知識圈的強勢主流，但很多時候與中國人的民族特性格格不入，許多「民主」仍然流於形式，因此，韓少功嘗試從中國自身的傳統角度來反思，究竟何謂「民主」。例如他以中國組織幫會和宗祠爲例，認爲在中國組織業主委員會就是難，中國人恐怕還是有許多的老大心態，但韓少功吸收與接受錢穆的觀點，認爲把中國古代或傳統曾經使用的一些制度，全都視爲專制甚至獨裁，仍是囿於某種西方的想像和偏見。我以爲韓的這些辯證觀很合理，每種不同的文明與歷史，都可能生產出適合於它們的人性觀與社會制度，然而，接下來更困難的問題還是在於：時代畢竟已經來到了「現代」，回溯古典與傳統，當然是一種思考與應用的資源，但新的現代性歷史、社會，終究還是要面對更複雜的國際與世界關係，需要回應更多層不出窮的新現實變化與問題，如何在後現代的復古與開新之間，重新建立屬於21世紀中國人自身的尊嚴、主體性、社會制度與生活型態，進一步更精細地展開——農村、小鎮與城市、國家與個人、機械複製與大自然間等等新命題的平衡關係與想像，也是韓少功企圖引導讀者未來值得展開的視野與命題。

此外，作為一個敏感的歷史在場者及發問者，韓少功對於文革時期的「聖徒」化的傾向也頗有警惕。類似的發問與感慨，或許也是許多大陸知識分子的集體無意識，例如，蔡翔在《神聖回憶》也曾這樣反省：

我們曾經為正義而戰，曾經為理想而吶喊，清掃著這個病的世界的角角落落。我們曾經傷害過不少的人。有意或者無意，以神聖的名義，以「革命」的名義，直至我們自己被傷害。……物化的神聖便是這個世界的人間宗教，它以不同的形式出現：「革命」、國家、理想、民族、正義等等。拜物的瘋狂，代替了我們對彼岸的神聖嚮往。我們被這神聖之物所限制，再也無法展開個人對神聖的彼岸想像。<sup>17</sup>

蔡翔曾經親眼看到他的父親被批鬥，韓少功的父親則是在文革中自殺，他們都曾親身體驗「革命」或對某種抽象理想的追求，如何演變成爲一種家庭、心靈及歷史的傷痕，「革命」因此走向了它的反面，甚至變成一些空洞的符號。當然，這並不意謂革命不再需要或不重要，而是知識分子究竟應該如何清理與解釋「革命」的負面危機？韓少功認爲，無論是表現自己的無私的「奉獻型競爭」，或是揭發伙伴與幻覺中的敵人的「攻擊型競爭」都應該要警惕，同時，人群之間的問題，也不一定都適用「階級鬥爭」來處理，在這裡，韓少功似乎仍以某種唯心主義爲思考的方法，認爲中國革命中的許多階級鬥爭的問題：「與其說體現了階級與階級之間的鬥爭，不如說更像是人類對自身弱點的鬥爭，甚至是每一個人肉體與精神之間的永恆緊張——即便在階級淡化之時也是如此」<sup>18</sup>，但他也辯證地看出，想取消階級鬥爭本身，或許也是一種革命變體：「取消階級鬥爭……重新討論市場、資本、私有制、個人主義的合理性……這幾乎是對革命的全面逆襲。有意思的是，這種逆襲的思想武器、精神能量、鬥爭經驗、運動形式、個人風采等無不來自既

<sup>17</sup> 蔡翔：〈神聖回憶〉，收入蔡翔《神聖回憶》（台北：人間出版社，2012年4月），頁25。

<sup>18</sup> 韓少功：《革命後記》（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4年），頁109。

有記憶，與其說是革命死亡，不如說更像革命變體。」<sup>19</sup>但這樣說，也仍有將問題模糊化的限制，並且可能仍然是一種迴避——迴避階級作為一種客觀存在的社會事實與矛盾。

韓少功因此很難有絕對的立場，所以在《革命後記》中，我們不難發現，他時常一下子批評左的錯誤，一下子批判右的錯誤，一會兒出現普世價值觀，一會兒繼續補充歷史事實或可能的現實細節。當然，在不同的歷史時期，辯證式地徘徊於左右之間也在所難免？畢竟無論左右，確實都有可能存在教條主義的錯誤，用韓少功的話，都有可能「用立場修剪事實，用謠言取代論辯」，很多問題一個作家也不可能完全想的清楚、說的明白，我目前比較傾向認為——這是韓少功給主體製造不固定、不教條的一種選擇和實踐。

《革命後記》末了有一段很特殊的敘述，相對於前面可能的務實，或許可以說是一種務虛的敘述，故事大致是說，敘事者「我」夢到了父親，醒來後記起小時候父親告訴他一個托爾斯泰的故事，故事中的尼古拉（托爾斯泰的大哥）也告訴托爾斯泰一個夢，說只要找到某個埋入屋後森林的小綠棒，世界上就再也不會有貧窮、殘疾、屈辱及仇恨，所以人都能幸福……。

夢中之夢的暗示，托爾斯泰相信了，韓少功也相信了——「小綠棒」就是對「小綠棒」的尋找本身。這帶有一種浪漫主義精神——對務虛之夢的一點執著需要它，如果沒有這些，只有理性與現實，恰恰恐怕很難讓人長期繼續面對現實。韓少功這種偶爾的柔軟和細緻（他已經夠理性了），對於推進及更新他的思想和歷史見解，其實有著明顯的正面力量，正如同在《日夜書》曾出現過的優點。<sup>20</sup>

---

<sup>19</sup> 同上註，頁 181。

<sup>20</sup> 芳菲跟韓少功的對話錄中，也可以看到韓少功對於過於理性的反省，他說：「我曾經相信理性可以包打天下，科學足以解決一切問題。但事實並不是這樣。……理性主義非常脆弱，一不小心就滑入虛無主義，似乎人什麼也不能做，怎麼做都沒有意義。」芳菲、韓少功〈理想的、或非理想的生活——對話韓少功〉，收入韓少功《山南水北·附錄》（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8年5月），頁 296。

### 三、《山南水北》：勞動書寫與冷情

《山南水北》簡體版完稿於2006年，2012年2月和2014年1月都曾再作過修訂。2014年台北「人間」出版社則出了繁體中文版。繁體中文版特別多收錄了〈鄉村英文〉、〈上訪者〉、〈夜生活〉、〈咆哮體〉等四篇（此四篇亦有收入2012年後的簡體版）和一篇〈台灣版前言〉，但沒有收2008年《山南水北》版後的附錄——韓少功跟芳非的對話錄：〈理想的、或非理想的生活——對話韓少功〉。

啓蒙姿態、農村勞動書寫、高度冷淡節制的情感，以及對大自然及非人類中心的意識等等，是此書明顯的特點。這是韓少功近年來一半時間旅居湖南汨羅鄉下，一半時間回到海南工作／生活的勞動結果。不同於隱居田園類型的《湖濱散記》（梭羅），或中產階級下鄉休閒的《山居歲月》（彼德·梅爾），他回到這個曾經作知青下放的原鄉，重新作為一線的勞動者下田耕種，跟當地的農民如實相處，直接去體會那些農民的辛勞與日常，在某種意義上，韓少功也因此得以更貼切地體驗和介入目前中國最嚴肅的農村、農民和城鄉發展的問題。

這種農村書寫傾向，其實台灣近十年間，亦有不少類似的敘事——很多知識分子選擇放棄他們在城市的低薪工作，回到有田的老家耕種與生活，重新思考土地與人的生命之間的關聯與意義。在實踐工作上，比較知名如賴青松的「穀東俱樂部」（同時有專書《青松e種田筆記：穀東俱樂部》記錄整個務農經驗）<sup>21</sup>和劉維茵（1975-）的《小村種樹誌》<sup>22</sup>，這兩部書都有許多共同的特色，例如以大自然的十二個月為劃分的結構，敘述回鄉務農、種樹、田居的相關經驗和感覺，舉凡整地、除草、防雷、請媽祖、神明等均在列。透過這種實踐性的書寫，作者也重新聯繫上了土地、地方性歷史、地方宗教文化、人跟大自然的氣候和其它動物

---

<sup>21</sup> 可參見網站：<http://blog.roodo.com/sioong>。賴青松同時也將他的整個回鄉務農的經驗，寫成專書：賴青松《青松e種田筆記：穀東俱樂部》（台北：心靈工坊，2007年）。

<sup>22</sup> 劉維茵：《小村種樹誌》（台北：智園出版有限公司，2013年）。

（如狗）之間的共生關係，由此也體現了不同於西方「現代性」下的本土社會意識和相對多元價值取向。

然而，不同於台灣近年的務農田居的相對「精緻」書寫，中國大陸的農村問題、城鄉差距的狀況恐怕是更為複雜。韓少功重新下鄉生活中所發現的問題，儘管早就已經跟溫飽無關，跟早年「右派」世代的高曉聲的陳奐生系列（上城、轉業、包產、種田大戶）的問題意識也不盡相同，90年代中的《馬橋詞典》（1996年）和此作《山南水北》（2006年）中，韓少功首先更注意且保留的是中國農村中較野性、原始的文化性格，以及農民轉向現代農業和現代生活的焦慮。二千年後，或許問題也仍沒有緩解，甚至更為嚴重，反映在《山南水北》中，他比較強調的意識或面向，我以為大致就呈現以下幾類：

第一，仍然是「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呼籲。作為一位知識分子下鄉勞動，儘管韓少功努力地想讓自己成為一個普通老百姓，但事實上，一般農民看待他的角度仍然不同，也因此他也無法擺脫農民期望他為人民「代言」的立場。在《山南水北·面子》和《山南水北·氣死屈原》兩篇文章中，都可以看到農民對生活和現代化的發展，有一些不同的意見（例如有些人覺得賺錢很重要，但也有些農民覺得這土地、這風景並無多大可觀），但農民並不願意真的站出來反映，或者，對許多發展雖然相當不滿，但又屢屢總要「維持現狀」，這時候韓少功的「啓蒙」姿態就會再次出現，儘管他非常清楚，自己在某種程度上，終究仍是一個「局外人」，同時，知識份子跟農民，在本質和立場上，也不可能真正融合，尤有甚者，當韓少功從知識分子的角度來看農民時，其實重視的更多的是接近魯迅對國民性，或者說文化人格上的關注和批評。然而，「五四」時期已經久遠，不同的歷史階段，是否應該有不同理解人格的方式？例如，懦弱是否從另一種角度來說，是一種較保守，但同時較無實際世俗作用的善良？如何辯證地看待今天中國農民的文化人格的問題或特質？並給予它們較豐富的歷史理解？或許因為韓少功總是使用辭條這種文體，篇幅過短，他暫時沒有展開這個問題。

第二、《山南水北》的農村書寫，企圖在目前世俗／現實忽視勞動的狀況下，特別強調與肯定勞動的意義——這個曾在社會主義時期崇高化，但卻又在改革開放下迅速世俗化的概念與實踐。韓少功似乎把勞動實踐哲學化了，在《山南水北·

《開荒第一天》這篇文章中，韓少功說：

我懷念勞動。……「操勞」才是了解事物最恰當的方式，才能進入存在之謎——這幾乎是一種勞動者的哲學。我在《暗示》一書裡還提到過「體會」「體驗」「體察」「體認」等中國詞語。它們都意指認知，但無一不強調「體」的重要，無一不暗示四「體」之勞在求知過程中的核心地位——這幾乎是一套勞動者的詞彙。然而古往今來的流行理論，總是把勞力者權當失敗和卑賤者的別號。<sup>23</sup>

進一步，他又說：

我們要親手創造出、動物以及微生物，在生命之鏈最原初的地方接管我們的生活，收回自己這一輩子該出力時就出力的權利。<sup>24</sup>

這個說法很貼切地點出，在目前中國大陸愈來愈工業化、資本主義的進程下，人類與工作、生活的關係，愈來愈像一顆小螺絲釘，都只是一種功能性的關係，人們都不太可能再回去那滿天星般的世界——一種人、土地和勞動的關係還沒有異化的世界。而恰恰是在這樣的新歷史條件下，韓少功重新將勞動與創造，跟接管生活聯繫起來，可以說是充份地表達了不願永遠被異化的抵抗精神。

第三，《山南水北》的農村書寫，對於大自然的其它生命，例如各式動物及它們的靈性，或中國農村自身的內在倫理、特性，甚至本土景觀，都有善意的尊重與理解。例如《山南水北·守靈人》涉及到性別問題，不同於「現代」與「文明」視野下的性別和生育觀，實有一種內在於中國農村實際狀況的同情：

我曾經一直以為，重男輕女僅僅是愚昧。很多現代的離婚者、獨身族、同

<sup>23</sup> 韓少功：《山南水北》（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8年5月），頁33。

<sup>24</sup> 同上註，頁35。

性戀以及丁克家庭，更不認為生兒育女是什麼非此不可的大事。我們的生活因此顯得更為文明。但我們得小心；我們是在握有退休金時說這些話的，是遠離墳前香火時說這些話的，在鄉下人聽來一定隔膜——正如鄉下人對無後的恐慌……恐怕不易被我們體會。<sup>25</sup>

又如，在《山南水北·窗前一軸山水》中，韓少功也從他鄉下窗前的山水，重新聯繫上到寫實／現實主義的關注。他注意到，在中國農村或現實的自然中，有時候，寫意就是寫實：

比如站在我家窗口來看，寫意其實是平易的，簡單的，樸素的，差不多就是寫實，甚至是老老實實的照相。一個畫家，只要他見識過中國南方的山水，尤其是見識過多雲多霧的雨季山水，見識過涌入大門和停駐手中的一團白霧，見識過掛在葉尖和繞在階前的一縷縷暗雲，不大悟於前人的筆墨，倒是不正常的。

最大的主義其實是誠實的主義，……無論受益於多少工具發明和技術改進，就其根本而言，可能都有一個最為現實主義（如果可以稱之為現實主義的話）——的經驗原點，只是不為後人所知罷了。<sup>26</sup>

在這個意義上，進行類比推論，很多我們從「現代」的標準看待農村的「鄉野傳奇」，可能也就只是一種現實的經驗。

另一方面，韓少功《山南水北》的文學／藝術特質也略有可觀。這方面當然過去也有很多學者／評論家都談過一些，例如跟《馬橋辭典》類似的辭條式的結構特色、更重視民俗、鄉野的主體性與傳奇性等。本文想補充一些對韓少功在敘

---

<sup>25</sup> 同上註，頁 77。

<sup>26</sup> 同上註，頁 128。

事上「冷情」<sup>27</sup>的風格特質的理解。

在《山南水北》跟韓少功的一些代表作中，我注意到只要是處理到人物——某些曾經一起下鄉的小知識分子，或某個農村的少年，都有一種非常冷的情感與特質。這種特質在大陸當代的農村書寫，或「知青」世代的書寫，都有一定的特殊性，無論是「右派」世代寫農民的高曉聲，或跟韓少功世代接近，出身農民底層的莫言、路遙，他們筆下的世界基本上還是相當有溫度的，而即使是後來再小一點的余華的《十八歲出門遠行》、《活著》或《許三觀賣血記》等，雖然也有一點冷淡，但整體上，我覺得韓少功的作品的冷情的特質更為明顯。台灣的小說家鍾文音因此就曾用「冷靜的完美敘事」、「好看的憂傷故事」來形容韓少功這種傾向。姑且不論韓少功這樣的書寫，跟作者本人的自傳／家庭經驗是否有直接的影響與對應——作者自己的記憶可能也都可能修改、選擇性運用，同時無法客觀證明，因此做這方面的追溯的意義或許不大。我覺得比較幽微且有意思的地方是在於，韓少功在處理這些人物時，雖然呈現了非常冷的風格，但與深情同構的特質，尤有甚者，這種冷的特質，應該被視為他的散文／小說的文體上的重要整體特質的關鍵部分。

例一，在《山南水北·相遇》裡，寫「我」遇到一個少年，敘事者揣摩或許未來他可能是個挑木炭的，但「我」不想說破，不想讓他認出自己的將來。這篇文章，收在 2008 年的簡體版的《山南水北》時，還配了「長樂鎮新街」上的一張圖，圖上面有這樣的一句標語：「對結伙搶劫持械搶者依法開槍擊斃」<sup>28</sup>，在這裡，「長樂鎮」的概念無疑的是一種反諷，反襯圖片上的標語，體現了敘事者很深的不滿——有著對大陸當下農村環境的失望，也有著對青年人日後也並無更好

---

<sup>27</sup> 本文之所以用「冷情」來概括韓少功《山南水北》主體與敘述上的風格特質，而未採用平靜、理性、節制等詞彙來概括，主要是筆者認為「冷情」也是一種溫度，用情亦深，同時還有一種主體自我否定的反省意味在，比居高臨下觀看與理解他者的理性與自我節制，某種程度上又再推進了一層，換句話說，「冷情」本身就包含了理性與節制。同時，這種「冷情」的特質，乍看下去是指向他人，但其實更多的是指向敘述的主體，是一種在對象與主體自我間，帶有高度張力的感性特質。

<sup>28</sup> 同上註，頁 266。

發展可能的預言，所以，「我」才不忍心點破。

其次，在《山南水北·老公路》中，「我」回起當年知青時代的人與人之間的情感關係——有一個年輕知青亮亮，在路上看見一台大客車，他知道裡面有他小從一起長大的兩位好同學，他不斷努力奔跑，想去追這輛車。那兩位高年級同學，有紅色的家庭背景，幸運地被招工進城，他追了一座山，一雙腳都碰出了血，但那輛車，車裡面的曾經的好朋友，還是沒有爲他停下來。年輕的亮亮回來後，大家都沉默著，誰也說不出沉默的理由。多年以後，敘事者「我」再度走在當年他追過車，但最終沒有追上的路面上，「我」忽然決定留在該地住一晚，找了當年的一個農工借宿，但對方竟然也已經成爲一個老頭，而且眼睛已經瞎了，對方捉住他的手，對他說：你怎麼不早點來啊！

這篇散文的主題其實可以理解成：錯過。我們都想相信人間有溫情，但在某些歷史條件下，人與人之間就是錯過，人性也不像自己所以爲的那樣重視溫暖的感情。亮亮的追車，眾人的沉默，是充份體會到這一點下的無言。而敘事者「我」，最後去看那個老農友，聽對方所說「你怎麼不早點來，你早來半年也好啊。我的眼睛已經瞎了，如今看不見你啦」也是如此。看似「我」的行動是有溫情的，但結果不過也只是無效的安慰而已。但「我」仍要要用這樣的書寫來提醒自己，「我」也曾在這樣的歷史條件下，與對方形成某種冷漠無情的錯過。我個人認爲，單獨來看，這是一篇很好的散文（當成小說看亦可，文類的意義在此不重要），不但充份地傳達冷的感情的狀態，也承擔了冷的自我批判的倫理意義。

類似的代表細節還有一些，在《山南水北·秋夜夢醒》，寫敘事者在失去父親後，獨自守著生病的母親，每天帶她出門散步，卻希望在陌生的人群裡永遠走下去——得以避開機關院子那些敵視和輕視。敘事者充份體驗到，並不是在「人民」間就能夠得到安頓，疏離有時是另一種安全感的來源，尤其在自身被當作「敵人」的狀態下。敘事者同時也想起以前的同學——當年得知敘事者的家在文革的遭遇，曾自覺或不自覺地，給予過同情與協助，但三十年過去，敘事者覺得，往事還是不堪回首，因爲改革開放後大部分人的日子並沒有更好。在這裡，敘事者將視角改用「你」爲主體，恐怕不是沒有意義的，因爲「你」更能傳達出這種疏離的冷情：

你很想向他們說說往事，但一遇到他們的目光就只能閉嘴。你的瘋人嘍語沒有聽眾。你藏在心底的逃犯故事乏味煩人。他們不愛聽這個。他們最願意談談麻將和彩票，談談三流電視節目。<sup>29</sup>

又或者在《山南水北·回到從前》，也這樣寫到：

又有一名老知青去世了，是失業以後無錢治病而夭折的。加上以前的兩位，已有三名同伴離我而去。這是成功人士圈子以外的事情。更多的工人在失業，更多的農民在失地，更多的垃圾村和賣血村在高樓的影子裡繁殖，這也是成功人士圈子以外的事情。<sup>30</sup>

農村現實環境每況愈下，曾經擁抱下鄉理想的知青在當中亦如是，老的凋零，新人沒有機會與希望。面對那麼嚴峻的中國社會和中國人情，只能不斷生產出「冷」來提醒自己維持清醒，才能繼續面對現實。

然而，也不是沒有歧出這種「冷」的敘述，我在《山南水北·老地方》中，注意到一小段雖然孤獨卻偶爾流露柔軟的空間：

我得檢查一下，得仔細檢查一下。這裡的太陽不是貼上去的反光熒紙，這裡的草木不是染成綠色的塑料製品，這裡的山水也不是投影在天幕上的照片，不會隨著電閘的關閉而突然消失。還好，我也沒有在這裡發現後台、樂池以及幕布。但我不知道，我在這裡喊著一個個姓名，為什麼你們都聽不到？為什麼從來沒有回應過我？<sup>31</sup>

這一篇不是寫現實，而是寫夢。不那麼現實的「我」，夢見「我」回了某個老地

---

<sup>29</sup> 同上註，頁 281。

<sup>30</sup> 同上註，頁 9。

<sup>31</sup> 同上註，頁 272。

方——一排沒有人影的小土房，一片如真似幻的靜謐和清潔。但「我」還是懷疑這一切是不是真的、是不是製造出來的？所以，當「我」檢查認定應該不是假的，難得動了溫情，想要喊喊看是不是能得到回應、但最終仍然是沒有回應，這樣的「吶喊」自然是極孤獨的，因此對清潔的原鄉的想望，終究讓「我」落下一顆眼淚。

如此柔軟的敘述，在韓少功的《山南水北》和前面所討論到的《日夜書》與《革命後記》中，都是很少的，但卻不能說不重要。他筆下的冷情無論作為一種風格、文體或主體特質，雖然有時候因為其過於自覺，而顯得有點刻意，卻也因為它的少，反而在閱讀上產生一種獨特的強烈感情的效果。

更深入來看，我認為還可以把韓少功《山南水北》中所提示的一些問題，視為兩岸現代性轉型過程的重要組成部分。我們大致不會反對，整個中國的農村、鄉土及當中的人的轉型問題，是近百年來中國「現代」轉型的核心，而事實上，台灣在大陸的鄉土問題的結構裡，扮演了非常關鍵的角色——由於上個世紀台灣稍早於大陸工商業化，使得台灣在某種程度上，長期移轉了許多作為第三世界國家的廉價勞動力的需要和壓力給大陸，早年甚至獲得了相當超額的利潤和好處，因此我一直認為，在更高的道義和倫理上，我們應該要跟大陸一起思考，並且部分地承擔大陸目前農村及農民所遭遇的「現代」危機。大陸的農村、鄉土問題，之於台灣，不能簡單地視為一個「他者」的問題，本身也應該是我們的責任。

當然，我們不能簡單地以台灣目前的農村的狀態和發展方式，來批判或類比大陸農村的困局。中國大陸由於有五四運動，再加上 1949 年以後的整套社會主義革命與實踐，在文化「現代性」的意義與追求上，大陸事實上遠比台灣的「現代性」更為徹底、激進且快速，再加上國家大，城鄉差距也大，也因此，對於大陸的農村來說，以我比較熟悉的文學材料來佐證——從 80 年代高曉聲寫的「陳奐生系列」，到路遙的《人生》和《平凡的世界》三部曲，都可以充份看出大陸的農民對於「上城」／「現代」的嚮往與追求，無論是不是對鄉土懷抱著一種道德理想，出走都是一種必要與必然。同時，大陸自改革開放以來，實行高速的城鎮現代化工程，教育、醫療資源也高度集中於城市，九〇年代後，菁英意識型態的上昇（包含一系列以西方現代知識為核心的教育制度）和資本、金權、人脈網絡的

日漸官僚化……，都讓大陸的農村農民的現代轉型問題，比台灣更嚴峻。所以，近年來中國大陸才會出現許多值得關注的底層書寫，比較新的作品例如：方方的《涂自強的個人悲傷》（2013年），以及石一楓的《世間已無陳金芳》（2014年）等等，在這些作品中，我們也不難發現到一種新的、更強勢的意識型態正在形成——「現代」對中國農民的吸引力已牢不可破，農村確實被新一代的子弟們，視為一定要脫離的出身或地方，大陸為了慢慢解決這個問題，亦開始生產出新的城鄉一體化的政策。這絕對不是我們台灣知識分子，簡單地呼籲或類比「台灣經驗」——例如召喚農民工或他們的子弟回到農村老家，或知識分子回鄉提倡一種農耕與田園生活，就可以解決、安頓的現實。

韓少功每年有一半的時間在鄉下務農、勞動，一半的時間仍留在城市，從「知青」時代他就見證了許多大陸農村的狀況，必然深刻地明白大陸農村和農民的「現代」困境，已經不是簡單地「啓蒙」能夠回應——事實上，「啓蒙」本身就是「現代」邏輯下的一種，如果不能跳脫「啓蒙」的視野，讓中國農村與農民本身的意義與價值，挺立成另外一種足以平衡，或說抗衡西方現代性的「本土現代性」主體，中國農村與農民，將仍然只能繼續扮演底層及受損的角色。因此，一再重讀韓少功的《山南水北》，我不能特別留意到——他在許多人物書寫的小節裡，其實涉及到許多看似以傳統的手段，但最終仍能靠近並建構出另一些本土的「現代」的視野與秩序——在中國現代轉型至今僅僅百餘年的階段，不能說完全沒有價值。當然，由於韓少功畢竟也是個知識分子，深受上個世紀80年代西化意識型態的現代性的影響，必然也有其菁英姿態和想「啓蒙」他者的傾向，所以他有時候仍然會對當中的某些人事、世俗生活和價值追求，提出他的不耐與批評（如前文所述）——這也不只在《山南水北》，在《日夜書》中，我們仍然會看到這樣的理解——田園鄉土不可能完全安頓一個現代知識分子，但其實應該不妨礙我們為它正面的本土「現代」性的意義辯護，並將本土現代性的價值亦挺立起來：

我經常回想這一個深夜，回想那濃烈的菜油味，那乾稻草暖烘烘的氣息，那一束月光投照在碾台上如霜如雪。我靜聽窗外的蛙鳴，靜聽草窩裡的呼呼鼾聲，不能不大為驚訝地想到，幾十年後我也會是這樣子？也會鼾聲粗

野，磨牙聲猙獰，偶爾還在亂糟糟的褲頭裡放出一兩個響屁？生活正在眼前展開，正滴滴答答撲面而來。如果我不願像他那樣活，不願像他那樣掙吃掙喝然後生下一窩「公糧」「餘糧」「糧庫」（筆者註：底線部分指涉的是小孩），那我又能怎樣活？<sup>32</sup>

陸文夫早年有一篇寫鄉下人賭博的小說，那時的陸文夫就已經有了一種想像或意識——如果我們覺得某些舊的文化不好，那必需創造出另外一種更合理健康的方式來取代，推而言之，如果我們不滿意目前的西化「現代」性，那麼建構與挺立另一種本土的「現代」性，也就有其必要。韓少功以他文學和思想家的直覺，有時候精確地捕捉到那些農村生活中的本土現代性的靈光。一些舉例分析如下：

《山南水北·中國式禮拜》，講到「我」的車因連日暴雨卡在鄉下路上，只能暫時停在野地，「我」雖然很擔心，但事實上什麼事都沒有，因為當中有一種鄉村隱性的道德秩序和道德監控模式在起作用。此外，此篇也提及鄉下的一些祭祀儀式——有助於整體現代社會秩序的平衡，例如與大眾消費文化結合的供品，和衍生出的文化表演節目（如儼戲），往往能豐富化人的存在感覺與主體精神，不能說完全是傳統的「迷信」。尤其是，在中國大陸在長期破「四舊」的條件下，隱形的道德監控和民間的祭祀儀式，卻不因現代政治而完全消失，本身就足以說明它們已內在人心，成爲了一種新的本土現代主體的「選擇」。

類似的邏輯在第〈知情人〉這篇中亦存在。〈知情人〉寫鄉下人的網路和信息的傳播速度與方式：「他們互爲眼線，互通機密，裝作不認識我的樣子，只不願意說破罷了。他們似乎有一種通過風聲和鳥語來洞察世界每個角落的能力。」<sup>33</sup>這裡的詞彙使用「眼線」、「機密」，頗有冷戰時期的感覺模式，雖然可能不無誇大，但也可以被理解爲大陸本土現代性的一個小環節。

〈開會〉，寫一個鄉村開幹部大會，賀鄉長宣布禁止類似六合彩的私彩，卻遭到農民強烈反對。此時的鄉長，完全沒有採取西化的「現代」決策模式和手段，

<sup>32</sup> 韓少功：《日夜書》（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13年3月），頁35。

<sup>33</sup> 韓少功：《山南水北》（台北，人間出版社，2014年7月），頁183。

而是在開會的過程中，趁亂趁勢，以鄉民罵娘的道德漏洞，轉化成為一種泛道德化的群眾壓力，最終讓鄉民不敢再提反對的聲音——同意了禁私彩的政策，這種以看似傳統的方式發展現代決策模式，令作者也心生佩服。

另一方面，中國鄉土自身的現代性轉化，也並非僅僅只停留在對鄉土的精神、生活與秩序再造的關注，在更廣泛的視野裡，鄉土、農村仍然必需要建構跟城市之間的合理關係。從一種個人身體感的真誠，《山南水北》中身在農村中的作者，偶爾也會懷念起城市，「我」覺得城市最誘人之處，有一種：「人們互為隱者的一份輕鬆」<sup>34</sup>，換句話說，城市能夠擺脫過多被關注的限制，即使再關心與認同鄉土，「我」偶爾也難免覺得，在鄉下：「我也感到自己是一個公共場所的雕像，日長月久地示眾，多少有點累。」<sup>35</sup>——大陸的農村鄉土，經歷過社會主義革命改造，組織及動員能力極強，一個外地人如果進入了那樣的空間，反而更容易受到關注，弱化了所謂的「自由」。是以，韓少功從中延伸出去認為，我們必需思考：「世界上為什麼會有城市」的相關問題：「人們為什麼進入城市？到底是為了渴求鄰居還是為了擺脫鄰居？是為了進入群體還是為了逃避群體？」<sup>36</sup>或許這也是韓少功一年中仍有一半的時間需要留在城市的關鍵。而當小鎮、或城鎮化的結構，在近年愈來愈形成中國大陸的新的大宗主體，城市、小鎮跟農村鄉土之間的關係與互動，也必然是未來建構更合理的「現代」性中的重要主題。韓少功可以說是這方面視野與題材的先行者。

其它比較有特色的，還有〈上訪者〉：寫一個有點小聰明的鄉下痞子，由於在城鎮工作失敗，回鄉找機會，而且非常聰明地以本土化之名搞投機：「我們本地人要餓死了，那又怎麼辦呢？」但是，當他遇到也一樣懂得鄉土文化人格問題的賀鄉長，就完全產生不了騙人的效果，可以說充份以本土治本土。然而，一旦賀鄉長想要徹底處理掉這個痞子，把他開除黨籍，鄉民反而卻又大多不贊成——大家似乎一方面不希望做人太絕，二方面鄉民們還有一種毛時代的「人民內部」

<sup>34</sup> 同上註，頁 184。

<sup>35</sup> 同上註，頁 185。

<sup>36</sup> 同上註，頁 185。

的邏輯（毛時代的革命邏輯，本身也是現代性的一種產物），覺得黨應該要承擔起這類人的改造責任，把他開除黨籍反而是把責任轉移給了群眾，對群眾並沒有任何實際現實的益處。韓少功以一種非常生動的敘事，敘述這種中途現代性的狀態。這是不是能理解為是一種稀釋、延緩、平衡目前城鄉鎮突與國民性轉型的一種「本土現代性」的能力呢？

〈氣死屈原〉，寫本來「我」想引導農民作一些生意，但農民興趣不大，因為覺得賺的錢可能不多，寧願繼續打麻將。然而，當鄉民們發現鄉村幹部以發展旅遊業的名義，企圖占外鄉人暴利的便宜時，他們反而告訴外鄉人這兒沒什麼好看，給自己鄉人（幹部）拆台。鄉民的回應方式，儘管不無一些個人的私怨，但另一種平衡的公共品格，也在這當中素樸地生產出來。

#### 四、結語：朝向中國未來的本土現代性

韓少功在跟芳菲的對話中曾說：

現代化就是工業化和都市化，是生產要素向核心地區不斷集中。這一過程可以讓一部分鄉村搭車，比如讓郊區農民受益。但大部分鄉村在一般情況下只可能更邊緣化和依附化，所謂「走下坡路」。……眼下工業反哺農業，加大財政支農力度，充其量只是抽血以後適度還血。……需要反思現代化的基本理念和體制，但這樣做可能要求過高，現在也言之過早。<sup>37</sup>

韓少功所言甚是。中國的現代性，甚至兩岸的現代性，基本上是近百年的西化現代性的結構下發生及發展的一種結果，由於它確實帶來許多新的解放與活力，在某些歷史階段，也大符提昇了許多中國與兩岸人民的現實生活，因此任何本土自行轉化的價值，要形成新的主體性（或中和西化現代性中的負面），都不是一件

---

<sup>37</sup> 韓少功：《山南水北》（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8年5月），頁292-293。

短期可以達到的工程，儘管那當中存在著不少對中國人民而言更切膚的理想。而對於一個作家、知識分子及思想工作者而言，韓少功也只能善盡自己的一份責任。

因此，如果我們將《山南水北》、《日夜書》、《革命後記》一起聯繫來看，或許更能理解韓少功的苦心——這三部書都可以視為韓少功近十年有機的思想建構，是他分別從不同的角度，思考中國的本土「現代」性轉型的重要組成部分，如果說《山南水北》是他活在當下的新實驗（仍持續進行），《日夜書》和《革命後記》就是他清理及回應過去的努力，只有整合起來，我們才能理解韓少功嘗試走向的未來——透過有勞動、革命與公共實踐等思想資源的新中國的歷史中的再發現與檢討，才能繼續徵用它們作為前進的方法與力量。在這個意義上，《山南水北》的成書年份雖然早於《日夜書》與《革命後記》，但它仍再實踐與推進的正是中國未來的本土現代性。

## 徵引書目

王力堅 2008 《天地間的影子：記憶與省思》，台北：華藝數位出版。DOI:10.6140/AP.9789868430723

王增如、李向東 2013 《上山下鄉》，台北：人間出版社。

吳曉東 2014 《文學性的命運》，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

高 皋 1999 《後文革命：中國自由化潮流》，台北：聯出版事業公司。

定宜庄 1998 《中國知青史：初瀾》，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陳永發 1998 《中國共產黨七十年》，台北：聯經出版公司。

（美）費正清 1999 《偉大的中國革命》，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

（美）麥克法夸爾、費正清編 1998 《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中國革命內部的革命：1966-1982》，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

蔡 翔 2012 《神聖回憶》，台北：人間出版社。

韓少功 2008 《山南水北》，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

韓少功 2013 《日夜書》，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

韓少功 2013 《日夜書》，台北：聯經出版公司。

韓少功 2014 《革命後記》，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

鄧 賢 2005 《中國知青夢》，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

賴青松 2007 《青松 e 種田筆記：穀東俱樂部》，台北：心靈工坊。

劉維茵 2012 《小村種樹誌》，台北：智園出版有限公司。

# **A study of historical introspection and perceptual characteristics in Han ShaoGong's Works in recent decade.**

*Huang, Wen-Chien*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Tamkang University

## **Abstract**

This article aims at Han ShaoGong's three representative works in recent decade, and analyses and comments his history reflection and qualitative emotion si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Chinese government and Cultural Revolution, including the life and labor practice in the countryside and Educated Youth, as well as the recognition and argument of the history of Cultural Revolution in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is article, despite the differences of the time of publishing and materials, on the whole, it remains as an important portion of his reflection from different angles and a reflection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local and modern society. If we take "The South of Mountain and The North of River" as an experiment of his living in the moment, the others would be his clearance and responses of past endeavor. Only by integrating them can we conceive the ideal future he's trying to lead us to. By means of the rediscover and review of the new Chinese history of physical labor, revolution and public practice, we can move forward powerfully with them. On the basis of the meaning, even though the fact that the publishing of "The South of Mountain and The North of River" is prior to

“Day and Night” and “An epilogue of Chinese revolution”, what it continues to practice and proceed is exact the native and modernity of Chinese in the future.

**Keywords:** Educated Youth, Cultural Revolution, Native and Modernity, Physical Labor, Perceptual Characteristics